

计划生育理论研究

浙江省迁入女性人口
婚姻生育调查

徐爱光 郑学毅 张万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浙江省人口迁移流动十分活跃。在迁移流动行列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迁移人群——外省婚迁女性,数量很大。她们给浙江省人口的婚姻、生育等方面带来了很大影响。

一、迁入浙江女性人群的现状与特点

外省籍女性迁入浙江的婚姻迁移,是指外省女性以婚嫁方式、以在浙江农村择偶落户为目的而进行的迁移。改革开放以前,这类迁移流动尽管存在,但数量很小,没有形成一股迁移流。至80年代,这种婚姻迁移出现了与日俱增的发展势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婚迁格局。据统计,截止1990年底,迁入浙江农村婚配的外省青年女性达97 427人,目前已逾十万。这股迁移流的形成,有如下特点:

(一)流量大,来势猛。浙江迁入女性人口形成婚迁流,大约始于1984年前后。随着时间推移,数量不断增加。1984年前,有外省籍迁移女性落户的,主要是经济发达的

浙北几个县。1988年,迁入规模骤然增大,流入地域不断扩展,从浙北向浙南,逐步遍及浙江每个市县。据嘉兴、湖州市区、萧山9个县区1990年底统计,33 683名迁入女性人口中,1985年前迁入的2 768人,占8.22%;1988年后迁入的有22 681人,占67.34%(见表1)。

经计算,外省女性迁入浙江的时间中位数是1988年7月。就是说,至1990年底,外省女性人口有半数是在1988年7月份后迁入的。仅2年多时间,迁入量就占到了半数。可见,外省女性人口迁入浙江势头之猛。

(二)年龄构成轻,处于生育旺盛期。外省女性涌入浙江是一种婚姻迁移流动。这就决定了迁入女性绝大多数是未婚育龄人群。嘉兴郊区的迁入女性中,迁入时年龄在20岁以下的占21.07%,不到23岁的占64.16%。自1988年形成大规模的迁移流后,迁入女性人口的年龄有下降的趋势(见表2)。另据湖州市区、嘉兴郊区、萧山市1990年统计,1.8万名迁入女性人口中,20岁以下的占3.85%,20~22岁的占27.38%,23岁及以上的占68.77%;其中湖州市区的7 356名迁

表2 嘉兴市婚迁女性迁入时的年龄构成(%)

时 间	20岁以下	20~29岁	30岁以上
1988年前	4.83	91.20	2.97
1989年	11.59	87.55	1.76

表1 外省女性人口迁入的年度分布 (%)

地 区	合计	1985年前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嘉兴7县区	100.00	9.32	10.96	11.93	14.77	28.51	24.51
湖州市区	100.00	9.64	11.74	16.75	16.71	20.20	24.96
萧山市	100.00	4.79	4.89	16.52	24.19	25.39	24.21
合 计	100.00	8.22	9.60	14.85	17.98	24.77	24.59

入女性人口中,20~30岁的占94.85%。各地调查也表明,外省迁入女性年龄20~30岁的占90%左右。这表明迁入浙江的女性人口是一支庞大的婚育大军,具有较强的生育势能。

(三) 原籍分布广, 但相对集中, 且民族较多。据统计, 除西藏外, 迁入浙江的女性人口来自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29个省区。省外婚迁女性虽然来源地分布广, 但又相对集中于若干省区。其中来自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5个省区的有69 458人, 占总

迁入女性人口的71.3%; 来自浙江邻近省份如江苏、安徽、江西的也有14 344人, 占14.7% (见表3)。另外, 杭州、嘉兴等地还发现有来自越南的婚迁妇女。这些迁入女性人口来自约30个民族。据嘉兴郊区和萧山市统计, 10 605名迁入女性人口中有1 557人

表3 浙江迁入女性人口的原籍省区分布

	合计	四川	贵州	湖南	云南	广西	江西	安徽	江苏	其他省区
总数	97 427	19 999	17 138	11 458	11 192	9 671	8 251	4 664	1 429	13 625
占%	100.00	20.53	17.59	11.76	11.49	9.93	8.47	4.79	1.47	13.92

为少数民族, 占14.68%。

(四) 流入渠道多样, 表现为明显的自发性。外省婚迁女性进入浙江的途径比较复杂。最初, 主要是人贩子贩来和浙江外出男青年带回来的。1987年后, 方式有所改变。据萧山市和嘉兴郊区调查, 外省女性婚迁的方式, 基本上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介绍型, 即通过已在浙江落户定居的迁入女性牵线搭桥而来, 然后再将原籍女青年或自己的姐妹带来, 这种类型占绝大多数, 约占迁入女性人口总数的93%; 二是携入型, 即浙江一些男青年自己在外地物色带入的, 这种类型的约占迁入女性人口的3%左右; 三是自荐型, 即外省女性本人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浙江条件比较优越而慕名前来, 这种类型迁入的约占3%; 四是拐卖型, 即外省女性被拐卖或借婚嫁为名诈骗流入的, 这种类型迁入的为

数极少, 不到迁入女性人口总数的1% (见表4)。不论通过哪种渠道迁入, 外省女性在浙江农村落户后, 男方一般要付给介绍人或女方父母一定费用。从萧山和嘉兴郊区调查的情况看, 男方付给介绍人从30元到3 200元不等, 平均每户所付为1 000元; 付给女方父母从100元到3 800元不等, 平均每户所付为1 500元。

(五) 文化程度较高。在一定条件下, 文化素质的高低与人口的迁移流动具有密切的关系。较高文化素质的人容易加入人口迁移流动行列。同样, 浙江迁入的婚配女性的文化素质也普遍高于其迁出地农村女性人口的平均文化程度。我们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据萧山市、嘉兴郊区调查, 迁入女性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数为6.8年, 高于浙江农村同年龄组女性人口, 更高于全国农村同年

龄组女性人口的平均水平 (见表5)。尤其是文盲、半文盲比重, 浙江迁入女性人口仅占4.91%, 而浙江、全国的农村妇女却分别为19.88%、27.63%, 远远低于全国和浙江农村。可

表4 外省女性婚迁浙江的方式

	合计	介绍型	携入型	自荐型	拐卖型	其它
萧山市	7 776	7 356	217	167	26	10
嘉兴郊区	2 829	2 497	95	186	51	0
总计	10 605	9 853	312	353	77	10
占%	100.00	92.91	2.94	3.33	0.73	0.09

表5

15~39岁农村妇女文化程度比较

(%)

	大学	高中	初中	小学	文盲半文盲	平均上学年数
浙江	0.01	5.70	30.66	43.75	19.88	6.1
全国	0.02	4.08	25.59	41.96	27.63	5.4
婚迁女性	0	4.05	43.48	47.11	4.91	6.8

资料来源：浙江和全国数据来自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

以肯定，浙江迁入女性人口的文化程度要比其原籍女性人口高得多。另据我们对262名迁入女性的配偶或择偶对象所作调查，其男方文化程度如下：文盲半文盲占32.44%，小学占24.81%，初中占40.08%，高中占2.67%，人均受教育年数为5.9年。可见，外省迁入浙江的女性人口的文化程度也高于男方一个档次。

二、外省女性人口迁入浙江的原因

促使外省女性人群源源不断地迁入浙江农村婚配，从整个迁移流动的过程来看，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 迁出地与迁入地在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异形成强大的拉力，是促使外省女性人口婚迁浙江的根本原因。人口迁移流动的一般规律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又是客观存在的，从而也就决定了人口的地域转移具有客观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内地省区尤其是西南省区的经济虽然也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原有基础薄弱及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其经济的发展速度却不及诸如浙江等一些东南沿海地区。因而，浙江农村与中国中西部等大部分内地省区农村的经济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1989年抽样调查，农民的人均收入浙江是1010.72元，四川为494.07元，湖南为558.64元，贵州为430.34元，广西为483.04元。可见，在外省女性大规模迁入浙江的1989年，女性婚迁较

集中的省区与浙江相比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收益差异，而经济上的差异，对人口的迁移流动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因此，改革开放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在客观上为更大规模的入

口迁移流动创造了条件，使经济落后地区的一些女青年把寻求美好生活的希望寄托在经济发达地区。婚迁自然成了农村女性所向往的改变环境、摆脱贫困、找到理想配偶的途径。

由于浙江农村的生活水平较之迁入女性原籍农村要高得多，所以她们一旦在浙江落户后，多数人思想稳定，生活安心。从这些女性在浙江的分布来看，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美称的浙北占70%。这是因为浙北较之浙南，经济更为发达，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因此，迁入浙江女性人口的地域分布，也同样说明经济上的差异决定了婚迁女性的迁移方向和迁移量。经济差异的客观存在，意味着浙江婚迁女性人群的规模还将不断增大。

(二) 外省女性迁入后的自身生活变化，信息传递和链式效应，在婚迁流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对迁入地情况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口的迁移流动。人口的迁移流动往往是流向自己较为了解的地方，尤其是对远距离婚迁的女性来说更是如此，从而也就决定了信息传递，特别是相互熟悉的人之间的链式效应在女性婚迁中的特殊作用。原先婚迁浙江的外省女性，在短时间内大多数生活发生了明显变化，收入不断提高，职业有所改变，切身感受到浙江农村条件比其原籍地优越。这种信息通过多种途径传回原籍，吸引了那些向往更好生活的年轻女性离开原籍，进而促使

亲带亲、邻带邻，不断把自己的姐妹、亲戚和同乡同村的姑娘带入浙江，形成“滚雪球”态势。信息传递范围的不断扩大，加速了外省女性迁入浙江这股婚迁流的形成。反过来，婚迁流的形成，又进一步扩大了婚迁女性对浙江生活情况和地域范围的了解。正是由于外省迁入女性人群自身变化通过信息渠道所起到的“中介”作用，所以，她们在浙江农村的分布也相对集中，即浙江农村某一个地方的外省迁入女性，其原籍大都集中在几个省。如迁入湖州市的20 037名外省女性人口中，主要来自贵州和云南，占56%；迁入嘉兴市的女性人口主要来自四川和云南，占57%；迁入萧山市的女性人口有4 355名来自广西和湖南，占56%。从一个乡或一个村来看，外省女性的原籍相对集中的情况更为明显。

（三）浙江一些农村未婚青年婚配比例失衡，为外省女性人口得以婚迁提供了一个较大的“婚姻市场”。一个人口总体的性别比，大体上是保持平衡的。但由于历史、社会等种种原因，某一地区、某一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却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浙江就是如此。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浙江省15岁以上人口的性别比是正常的，为101.27，男性仅比女性多19.79万。其中20~34岁年龄组的性别比为99.11，女性比男性多5.39万。但从未婚男女的性别比看，情况却大不相同。15岁以上人口的未婚性别比为144.30，男性比女性多151.36万，其中20~34岁年龄组的未婚男女性别比为157.40，男性比女性多74.48万。浙江一些农村婚配上的女性不足有历史的原因。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部分山区县男女性别比偏高，如文成县和太顺县35~54岁组人口性别比分别是166.17和175.48。这部分人正好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出生的。当时由于生活困难和传统的封建陋习，溺弃女婴现象比较严重，再加上医疗卫生条件差，女婴死亡率较

高。随着时间推移，这部分人口中的女性不足，因而出现大年龄组男性人口普遍与低年龄组女性人口婚配的现象。解放以后，男女性别比虽有所缓和，但一些农村依然存在失调问题。婚配较集中年龄段的男女性别比相差悬殊，使一些男青年择偶困难。另外，浙江的商品经济发展以后，一些农村的姑娘设法嫁到城镇，从而更加重了农村青年婚配比例失衡的状况。因而，使得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或自身有缺陷，文化程度低，年龄偏大的农村未婚男青年，在当地择偶发生一定困难。据对262户有外省女性落户的男方家庭调查，其家庭条件在当地属中下水平的有253户，占96.6%，男方残疾的有6人，占2.3%。因而，浙江一些农村择偶困难的男青年，就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外省女性，并通过各种途径与外省女性婚配。

三、浙江迁入女性人口婚育状况及带来的影响

（一）婚育状况

外省女性迁入浙江农村婚配，绝大多数是以择偶落户作为直接目的的，所以在婚姻和生育上表现为如下特征：

1. 先婚后爱。外省女性与浙江农村男青年缔结的婚姻关系受到经济、地理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婚配方式往往是先同居或形成事实婚姻后再逐步建立感情。对迁入女性来说，她们考虑的首先是安家落户，不苛求男方条件；而浙江农村择偶困难的未婚男青年，由于受家庭及周围环境的影响，往往求偶心切。所以，彼此对对方条件的要求一般不是很高，在家境、长相、年龄等方面，一般不苛求。

2. 夫妻年龄相差大。按照传统，男方的婚配年龄只是稍大于女方，一般相差2~3岁。据1987年浙江1%人口抽样调查，妻子年龄平均比丈夫小3.3岁。而迁入浙江农村婚配的女性，迁入时的年龄一般比较小，她们所能选择的当地男性的年龄又往往比较

大,因此,从婚配年龄上看,妻子比丈夫平均年龄要小6岁以上。据对1674名在绍兴县安家落户的外省女性调查,夫妻年龄平均相差6.01岁。

3. 事实婚姻突出。婚迁浙江的女青年为了能尽早落户,往往是尽早婚配。据浙江42个县区1990年底统计,迁入的25769名女性人口中,到浙江后婚配成家的有24526人,占95.18%。但这些成家落户者,并不完全是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才成为夫妻的。其中,非婚同居或先生下孩子而造成“事实婚姻”的有5111人,占女性迁入总数的19.83%;经办理合法婚姻登记手续(包括婚前有非法同居史)的为19415人,占女性迁入总数的75.34%。

4. 非婚同居普遍。以择偶落户为目的的外省婚迁女性,往往是一流入浙江就与当地未婚男子非法同居。这种现象极为普遍。据萧山、桐乡、海盐、海宁、嘉兴郊区5个县区调查,18614名迁入女性人口中,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有5020人,实际已非婚同居的有4924人,占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人数的98.09%。其中有不少是未到法定最低婚龄而同居的。

5. 计划外生育严重。非婚同居和事实婚姻的大量存在,伴随而来的是未婚先育和计划外生育严重。据嘉兴郊区统计,2829名外省女性人口中,至1990年底共出生了1716个孩子。其中计划外生育409人,迁入女性计划生育率仅为76.17%,而1990年嘉兴郊区的计划生育率为99.26%。可见,外省迁入女性的计划外生育大大高于当地水平。另据萧山、嘉兴郊区、湖州市区统计,17961名外省迁入女性人口中,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有4065人,由此在计划外生育了863个孩子。已经登记结婚的对象,计划外生育也相当严重。

(二)对浙江的影响

外省婚迁女性大批涌入浙江婚配,对浙

江来说,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影响,利弊共存。

1. 缓和了浙江一些农村的婚配矛盾,却加重了浙江的人口压力,冲击了计划生育工作。10万外省女性迁入浙江婚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浙江某些地区婚龄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调,解决了一些大龄男青年的婚配困难。正如有些人所说,外省的“祥林嫂”嫁给了浙江的“贺老六”。这种婚配,并不象有些人所说的,缺乏感情基础,家庭关系脆弱。我们对一个乡91个与外省女性婚配的家庭调查,其中只有两户夫妻关系不好。可以说,外省女性在浙江落户后的夫妻关系绝大多数是比较和睦的。而且这些女性在浙江落户后,勤劳持家,思想稳定,生活安心。从这种意义上说,浙江农村一些男青年婚姻问题的解决,对促进浙江的社会安定有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大批正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外省婚迁女性涌入浙江,进而又新生育了大量人口。人口的机械增长带来了人口的自然增长,使浙江人口出生高峰的形势变得更为严峻,生育总量更加集中,给浙江实施人口计划和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直接影响。仅萧山市和嘉兴市郊区10605名外省迁入女性,就生了7667人。若按此比率推算,那么浙江省到1990年底因10万外省女性迁入而至少多增加7万多出生人口,两者相加多增17万人口。1989年,桐乡县出生人口虽控制在上级下达的指标之内,但有6个乡镇超生129人,这6个乡镇的外省迁入女性却生育了217人;嘉兴市一些乡镇突破生育计划,80%以上是由外省女性迁入过多造成的;湖州市超计划的乡镇,一孩生育中有74.7%是外省女性生育的。与此同时,外省婚迁女性早婚早育、计划外生育较为严重。当地男青年害怕其外省来的妻子“飞”走,往往希望其尽早怀孕生育;外省女性却利用地区间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上的漏洞,又往往在怀孕后

跑回原籍，生了孩子后再返回，从而给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使基层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2. 促进地区间经济交流，有利于浙江经济发展；但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对浙江来说，外省婚迁女性人口的年龄构成轻、劳动年龄人口多，从而为浙江农村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弥补了浙江农村某些行业或职业劳动力的不足。而且这些女性的文化程度较高，接受能力较强，容易促进其原籍与浙江两地间农村经济信息的交流。外省女性的持续增加，表明了浙江农村经济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在不断增强。这对于浙江经济的全面发展，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外省婚迁女性人口盲目自发地流入浙江，又给社会秩序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大量的非婚同居，尤其是未到法定婚龄同居或早婚，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有的为结婚安家需要，虚报、瞒报年龄或出具假证明。如嘉兴郊区就有2.4%的迁入女性虚报年龄。少数外省女性甚至在原籍有配偶，却利用浙江农村某些男方家庭择偶心切的心理，又与当地男子结婚或同居，如湖州市区就发现有39名外省女性在原籍有配偶又在浙江重婚的。这些问题的出现，造成了婚姻登记混乱，影响了婚姻法的贯彻实施。同时，这些迁入女性不但户口不随迁，而且有的没有身份证明，原籍婚育状况不明，新生孩子的户口难落实，给浙江的户籍管理工作增加了难度。此外，由于其流入渠道多样，随之带来了拐卖妇女、买卖婚姻、利用婚嫁骗取钱财等现象。萧山市和嘉兴郊区已落户的迁入女性中，被骗或被拐卖流入的有77人；萧山市至1990年底有170名外省迁入女性骗到钱财后逃回原籍，被骗金额达34.85万元。导致有的婚迁女性身心受到摧残，某些男方家庭人财两空。凡此种种，既给维护社会安定带来很大冲击，也败坏了社会风气。

大量婚迁女性进入浙江，在给浙江带来

影响的同时，也给其原籍以至全国带来一定影响。婚迁女性较多的省区，生育率明显高于浙江。这些女性迁入浙江以后，受浙江较高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和工作环境的潜移默化，其所期望生育子女数将会迅速下降。这对于全国来说，大量高生育率地区农村女性人口迁入低生育率地区，在宏观上减轻了生育压力；但是婚龄期女性人口的大量迁出，则造成迁出地农村男青年的婚配矛盾，加剧了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并将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外省女性人群迁入浙江婚配的趋势与对策

外省较贫困地区农村的女性人口自发地迁入较富裕的浙江农村婚配，从根本上说，是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浙江农村婚龄期人口的未婚性别比失调这一客观情况所造成。目前，内地一些省区尤其是中西部一些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浙江相比，还有相当大距离。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制约，内地一些省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浙江等一些沿海省市可能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差距。与此同时，浙江农村的婚配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不是近年内所能解决的。从调查的情况看，浙江农村的未婚大龄男青年还有相当数量。仅对一个总人口为21400人的乡调查，到1991年4月底，外省婚配女性已迁入171人，但当地还没有对象的男青年中，25~28岁的就是187人，28岁以上的有144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择偶比较困难。这表明，浙江农村对外省女性的婚配需求仍然存在，可容性很大。

总之，省际间的婚姻迁移，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人口迁移流动形式，它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对此，我们不能只考虑外省女性迁入浙江有积极的一面而任其无节制地发展，也不能单考虑其有消极的一面而任意加以堵截。应该从实际出发，认真加以研究、分析，积

极引导,合理疏导,兴利除弊,加强管理,促使婚迁女性合理迁移流动,才是符合实际的对策。为此,我们认为:

(一)运用经济利益导向,实行宏观控制。省际间婚配女性的单向迁移流动,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运用经济利益导向对人口的迁移流动同样实行有计划的控制,是能够做到的。对迁出地来说,最根本的是发展当地农村经济,治贫致富,削弱推力,使婚龄期女性减少盲目外迁。对迁入地来说,既可对迁入女性采取征收一定费用等经济上的限制措施,作为外省迁入女性婚配落户的附加条件;也可对当地择偶困难的男青年采取适当的经济扶持或优惠政策,帮助他们脱贫致富。同时,还可通过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间的差别,减少农村未婚女青年向城镇迁移流动,立足于就地解决婚配问题。

(二)通过宏观协调,实行双向管理。省际间的女性婚迁,给迁出地和迁入地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就要求对婚迁女性人口实行双向管理原则,迁出地和迁入地共同进行管理。单靠一方管理,难以见效。为此,建议由国家有关部门牵头,协调有关省区,制定适合省际间农村女性人口婚迁的有关规定,从宏观上建立对省际间婚迁女性管理的调节机制,加强宏观协调管理,逐步引导女性人口婚姻迁移朝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省与省之间,可考虑以迁入地管理为主,迁出地积极配合,成立双向管理协调机构,确定双方管理责任,定期互通婚迁女性有关婚育等情况,达到协调行动,齐抓共管。鉴于女性婚迁引起地区间生育数量的变化,国家在下达人口计划时,要作适当考虑,以减轻迁入地完成人口计划指标的压力。

(三)统一领导,实行综合治理。迁入女性带来的许多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就

管理而言,确实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主要涉及公安、民政、计划生育、妇联等多个部门。由于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协调机构,各部门自行把关,问题难以解决,因此必须由政府出面,加强领导,通过协调部门关系、落实部门职责、加强检查督促,实施全面管理。各部门要做到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统一行动,实行“条块”结合管理。比如公安部门负责迁入女性户籍管理和治安管理,及时查处并依法打击拐卖妇女、重婚、骗婚等违法犯罪行为;民政部门负责迁入女性婚姻登记管理,对非法同居、早婚等问题及时进行处理;计划生育部门负责迁入女性计划生育管理,发放避孕药具,落实节育措施,并负责把迁入女性的婚育情况通报给其原籍地;妇联负责处理买卖婚姻、调解家庭纠纷等问题,并关心迁入女性的生活,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

(四)利用各种手段,实行规范化管理。迁入女性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影响着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实施。这就要求在管理中,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手段,在迁入女性的户籍、婚姻、生育管理上,制订出一套规范性的管理措施,把好迁入女性的“进口”落脚关、婚姻登记关、生育节育关,并对迁入婚配女性实行全省范围内统一管理,把她们的户籍与婚育纳入当地正常管理轨道,以保证有关法律、法规 and 政策的贯彻落实,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还应坚持教育引导和群众自我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对迁入女性的法制教育。基层政府和组织对迁入女性应当一视同仁,帮助她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不断发挥她们在浙江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本文责任编辑:高春燕)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省计划生育委员会)